

■观察家

适时化解经济高速增长中三大矛盾

□袁秀明

近几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经济运行中仍存在着一些矛盾与问题,我们难以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解释这些矛盾与问题。对此,这些问题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第一,高速增长与高失业并存问题突出。尽管近些年我国经济增长快,但失业问题却越发突出。本来经济高速增长应该带来高就业,但是几年来我国却适得其反,不仅大批下岗职工再就业难、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无门,更值得关注的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

为什么高速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应该说,这与我国经济转轨有很大关系,即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吸纳的劳动力大幅减少。但从根本上讲,这与经济增长模式有关。近年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高投资和高出口。高投资投入的房地产、汽车及能源等行业大都属于资金密集型的行业,因而

吸纳劳动力能力有限。从出口看,出口加工业在我国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50%,由于只需熟练的简单劳动力,在出口大量增加的情况下,高校毕业生甚至比农民工更难找到适合的工作。

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还显示出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资金密集型行业超常发展,房地产、汽车制造等行业大发展,资本替代劳动,不利于就业。更有些地方近六成以上的财政收入靠毁灭性开采矿产资源。所以,靠资源型、重工业型的增长模式非常不利于就业的扩大。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如电信、金融、保险、旅游业等第三产业,是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途径。

在GDP的构成中,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还不到35%,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发展余地很大。适当提高利率,增加资本的使用成本,也有利于抑制资金密集型行业的超常发展,将资源向其他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的行业转移。

经济高速增长伴随失业率的

增加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也不符合百姓愿望,值得关注。我国正进入一个重工业化时期,资本密度加大,技术更新快,产业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但产业结构调整在强调产业升级时,应更多考虑到就业问题的解决,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加大力度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协调发展仍很重要。政府应加大对再就业培训的投入,尤其是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投入,并且有步骤地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在东部地区大力发展高科技及第三产业,从而在产业升级的同时缓解就业压力。

第二,经济高速增长与股市之间的相关性较弱。股市历来被称为宏观经济晴雨表,但近几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股市没有表现出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尽管目前这一局面已有所改善。

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我国是一个以银行体系为融资主体的国家。目前,银行

占我国整个融资比重在90%以上,而直接融资的资金规模非常有限。除了银行贷款,我国经济增长的资金来源还有外资涌入及企业自有资金投资。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更多靠投资和出口带动,银行资金支持在经济增长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银行信贷高速增长造就了高投资,高投资又造就了高经济增长。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及外资加工企业产品出口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显著。因而,靠信贷、外资以及相应的高投资和出口带动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一基本因素并没有反映在股市上。

另外,我国股市在我国融资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还比较小,加上存在着体制不完善、对投资者保护的力度不够等因素,这决定了当前我国股市还难以成为我国经济中的融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我国股市的快速发展。当然,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及能反映我国经济增长基本面的大型公司上市,我国股市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相关性在

逐步增强,这一点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

第三,经济高速增长与“低通胀、高房价”并行。无论从理论上讲,经济高速增长通常会引起或轻或重的通货膨胀。通胀率温和上涨是经济繁荣的一个征象,并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中国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没有引起任何通货膨胀问题,与之相伴的问题是低房价。

高投资以及高出口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消费需求并没有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消费需求相对走弱,使价格上涨动能减弱。况且,不断攀升的房价让人们感觉“囊中羞涩”,高房价对人们的消费产生了“挤出”作用,导致物价难以上涨。但是,眼下居高不下的房价并不计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中,形成了“低通胀、高房价”的特有现象。此外,子女教育费用和防癌养老等,使得人们需要提前做好储蓄准备。这些因素形成了中国的高储蓄率,在促成了银行的高信贷、企业的高投资及高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削弱了

居民的消费行为。目前,我国广大农村消费水平还比较低,但经济增长过度追求重工业化发展,并不能吸纳较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降低了他们的收入来源,也阻碍了农村消费需求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物价上涨。所有这些因素都成为形成低通货膨胀的核心原因。

我们认为,这种高投资、低消费的增长模式,使经济中蕴藏着极大的脆弱性,长期的高投资会产生过剩的产能,若有一天难以自我维持下去,经济增速将迅速放慢,并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困境和经济紧缩。所幸的是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宏观调控的效果也已初现。

总之,目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上述这些矛盾现象,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高投资、高出口的增长模式相关。高投资增长需要适度减速,且大力促进消费需求是非常必要的。这将有助于摆脱经济中的扭曲与脆弱性,解决经济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使经济发展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人物志·袁秀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大学商学院市场中心博士后。

■来自日内瓦

面对强势电话公司 消费者只能叹息吗

□徐千惠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因手机或电话问题,遭遇向实力强大的电话公司投诉无门又百般折磨。这里,我不妨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消费者的无奈之情。

Jason支付了单月手机费238美元,但二周后他的手机突然被停掉了。为此,他致电电话公司咨询,但却遭到了对方员工的大声训斥,说他不负责任,仅支付了2.38美元手机话费。但他确实通过网络银行支付系统将话费付了。第二天,他再打电话咨询开户的银行,并查询了他的网络账户的银行付款记录。当他确认已付款并在几天后收到付费凭据后,他再次致电电话公司,但电话公司依然没有告诉他手机的停机原因是否与没有支付话费有关,遗憾的是对方还是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相反,电话公司还让他支付了29美元的复机费,手机停机事件总算告一段落。Jason回过神来只能叹气,实在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再跟电话公司周旋了,此事也只能这样不了了之。

而Jenny在今年7月份买了一部新手机,尽管手机价格很贵,但商家许诺给她退款150美元(这种促销手段在美国相当普遍),并建议她购买一个两年期通话协议,且在指定的时间内寄出退款申请。在这种情况下,她毫不犹豫地购买了那个手机。几周后,Jenny收到了一封可让她随时跟踪退款过程的电子邮件。为此,她还暗自赞叹电话公司服务真是周到!

但是,她在几天后收到了一份来自电话公司的信件,告诉她拿不到退款。为此,她仔细查看了手机发票,并确认已签订了两年期通话协议。当地致电电话公司时,唯一让她能听懂客户服务代表的话是她无法获得退款。当地告诉她确实已签了那个两年协议后,客户服务代表还是执意要她再查一下。后来她还多次致电询问,但却被告知该电话公司从来没有寄出过那份信。这真是让她哭笑不得。这实在是件太累的事情。

其实,我也有我朋友那样的类似经历。上次家里安装电话和无线上网,约好安装工人在上午9点后来,但他早来了,家里没有人,他就走了。我再打电话预约,但因那位工人态度不好而打了投诉电话。接线员答应明天上午一定派人来,但结果是等到晚上还没有人来。我再致电电话公司,却被告知那个工人已“失踪”了,手机也关了。并且,要我耐心等待,说他们也没有办法。是啊,除了耐心和忍耐,消费者面对强势的电话公司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多声道

构建和谐中国 民营企业履行七大责任

黄孟复(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民营经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在中国推进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民营企业应履行七大责任。第一,推动发展的责任。第二,争取公平的责任。第三,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责任。第四,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责任。第五,遵守法律和规范的责任。第六,维护道德与诚信的社会责任。第七,参与光彩和公益慈善事业的责任。

降低境外融资比例 采取措施缓解“双顺差”

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面对经济失衡问题,我们应进一步调整汇率,但汇率不应该是唯一的措施,同时调动多个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对经济更为有利。缓解经济失衡的关键要从降低境外融资比例方面下手,因为企业大量从海外融资加剧了我国面临的外部不平衡局面,降低境外融资比例能够减少外汇流入,缓解外汇储备快速增长造成的经济失衡。

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转变:一个伟大的转折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多棱镜

□彭兴韵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6年11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多多少少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

仔细阅读央行的声明,不难发现,央行这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依据较今年的前两次准备金调整有了较大的变化,为了做一个清晰的对比,不妨将央行调整准备金后的声明摘录如下:“今年以来,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大力回收银行体系流动性,流动性过剩状况有所缓解。但是,当前国际收支顺差矛盾仍较突出,银行体系新的过剩流动性仍在产生,根据流动性的动态变化,人民银行再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是11月3日宣布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声明。

“当前经济运行中仍存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对外贸易顺差过大等突出矛盾和问题。此次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5个百分点,主要是为了加强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

信贷总量过快增长,维护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这是7月21日央行宣布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声明。

那么,前后两次调整存款准备金之间有什么差别呢?我们注意到,央行这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是因投资、货币与信贷的投资增长率过快,而是因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流动性增加。由9月末的经济数据显示,在投资、物价、信贷增长率各项指标趋缓的情况下,央行再次将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提高0.5个百分点,显然不是依据国内宏观运行内在要求,而是依凭国际收支顺差的变化情况作出这一决策的。

中国消费增长的三大催化剂

梁红(高盛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消费增长可以从家庭收入增长、积极财富效应以及消费者信贷这三方面获得动力。其中,收入提高是消费增长最关键的决定因素。新确立的私人住房产权和一路上扬的房地产价格,减轻了高昂的医疗、教育开支对消费的负面影响,股市大幅回升将有力推动消费需求扩大。消费者信贷更为便捷,中国家庭有能力购买住房和汽车等大宗商品。所以,这三方面都将为中国消费需求的增长提供更多催化剂。

(雨人摘编)

再提准备金率:为国际收支减压

□彭兴韵

信贷总量过快增长,维护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这是7月21日央行宣布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声明。

那么,前后两次调整存款准备金之间有什么差别呢?我们注意到,央行这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是因投资、货币与信贷的投资增长率过快,而是因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流动性增加。由9月末的经济数据显示,在投资、物价、信贷增长率各项指标趋缓的情况下,央行再次将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提高0.5个百分点,显然不是依据国内宏观运行内在要求,而是依凭国际收支顺差的变化情况作出这一决策的。

自今年3月份央行副行长吴晓灵的一番讲话后,以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来对冲外汇占款,便成了市场的一种普遍预期。这次央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恰恰反映了央行试图通过这一工具来对冲外汇占款的意图。这意味着,法定存款准备金功能在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在世界金融史上,法定存款准备金最早是为保持和提供金

■本期人物



■本期人物话语

中国绝不会对世界能源安全造成威胁

马凯(国家发改委主任):近年来,一些别有用心者制造和散布“中国能源威胁论”,说什么中国是国际能源的“掠食者”,中国无限制的能源需求“胃口”是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这是违背客观事实的,站不住脚的。中国过去不曾、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世界能源安全构成威胁。

融机构的流动性而产生的,后来又逐渐成了货币政策的一个工具。有意思的是,现在中国的准备金比率却成了回收和紧缩流动性的工具。

贸易顺差、国际资本的流入导致的外汇占款似乎成了中国货币政策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这次央行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来对冲由贸易顺差所产生的新的流动性,的确是属于一种无奈之举,但这恰好也反映了市场早先的预期,即以央行票据来对冲不断增长的外汇占款是难以继的。实际上,自1994年我国实行强制结售汇制之后,央行就一直在为应付外汇占款带来的货币扩张问题。简要回顾一下,央行的冲销操作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变化:减少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以持有的国债进行正回购操作——发行央行票据——现在的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每一次新的冲销操作方式难以以为继而逼出来的一种创新。

也许是“穷则思变”。如果再找不到其他的冲销工具,央行会怎么办呢?毕竟,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也不是可以无止境地提高下去的。于是,央行现在越来越将贸易顺差当成了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矛盾。除了平时的冲销之外,促使国际收支回到平衡状态,也日渐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这样,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升值,便成了解决中国国际贸易失衡的便捷手段。这至少是许多人的一种印象,也是很多人的一种要求。

汇率的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短时期的,长期贸易状况则取决于汇率之外的非金融因素。今年3月20日,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列举了造成中国贸易顺差的种种因素。可以预见的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的货币政策将不得不在国际收支失衡的背景下进行操作和予以完善。但问题是我们还是难以解决中国国际贸易收支失衡问题。我们认为,要改变由外汇占款给中国货币政策带来的诸多麻烦,中国只有彻底改变现行的结售汇制,从而才能真正切断国际收支与央行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直接联系。

■第三只眼睛

中国农业出路何在:城市化与工业化需求驱动

□杨英杰

关于中国农业的现状,一言以蔽之,较少的土地承载了过多的农业人口。换句话说,在现有土地存量和技术条件的约束下,农业劳动力呈过剩状态。农业人口过多,可以理解为单位农业劳动力产出过少。这其实是套套逻辑(tautology),因为如果单位劳动力边际收益处于递增状态,或其下降速度缓慢,可以抵消农村生活费用之上升,能保证农业从业者有比较体面的生活,也就谈不上农业人口过多的问题。现实则不然。

如何解决过剩农业劳动力,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出路在于城市化。城市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推动农地的相对集中和规模经营,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中下层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将从传统以粮为主的农业结构向肉、菜、粮并重。由此,农业生产结构也会相应地发生转变,即从长期的以粮为主的单一型农业结构向种植业、牧渔业并重的农业结构。

要而言之,上述两种意见都在关注同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一个强调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模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最终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一个强调以小型农场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即就地解决或依靠农业自身发展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

农业生产的产品,多数是为了交易,即以别人的需求为主。我们认为,这一需求的主要力量不会来自农业自身,只能来自二三产业,而二三产业的兴起只能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出现。城市化或工业化的标志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向二三产业的转移。这是世界工业化历史的通例,中国没有其特殊性,如果真有这种特殊性,也只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要求更为迫切。总体而言,我们正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在此阶段,正是需要农村劳动力作为二三产业的生力军,从而鼓励更多的劳动投入与农业生产以获取更大的农业收益。研究表明,到1750年,需要用210个工业单位、1600年需要181个工业单位、1500年需要108个工业单位所换取的同等数量的农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需求驱动”的效果对于增加农产品数量、降低农业从业人员以及增加农民收入,有着决定性作用。威斯多夫的最近研究更是表明,制造业生产率提高,通过农产品贸易方式的变化,使得农民将更多的劳动投入农业活动和生产,而农民食物产出的增加扩展了可用于市场贸易的食品材料数量,从而将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以从事更多的贸易活动。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其对农业发展的拉动作用也会愈加明显,至于农民以何种形式来满足因“需求驱动”对增加供应的要求,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无论是用现代化的大农场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小农场,应让农民自己来选择。政府要做的是保证这种选择的公平和安全。

因素及工业生产率也在提升。

埃斯特·博塞拉普的研究表明,即使没有工业革命,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增加往往推动人们的劳动更加密集和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能得到更高产出的技术创新,比如增加复种和采用一些新式耕作技术等,从而导致所谓“需求驱动”的技术进步。博塞拉普的研究给人以重要的启示,即“需求驱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除了劳动工具因素外,劳动投入的增加(主要表现为劳动效率的大幅提高)至关重要。中国自秦朝统一以来的两千多年,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生产工具改进并不十分突出。而1978年改革开放后农产品供应量和农民收入的增加,都基本上得益于农业劳动投入的增加。这种在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增加的拉动力就在于对农产品的需求的增加,不仅仅是农户自身的需求,更显然是贸易的需求,这种贸易主要表现为工业品与农业品的交换。

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仅占其全部时间的50%至60%,如果有利可图,农民会放弃更多的闲暇。事实也正是这样,工业生产率的增加更直接推动了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从而鼓励更多的劳动投入与农业生产以获取更大的农业收益。研究表明,到1750年,需要用210个工业单位、1600年需要181个工业单位、1500年需要108个工业单位所换取的同等数量的农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需求驱动”的效果对于增加农产品数量、降低农业从业人员以及增加农民收入,有着决定性作用。威斯多夫的最近研究更是表明,制造业生产率提高,通过农产品贸易方式的变化,使得农民将更多的劳动投入农业活动和生产,而农民食物产出的增加扩展了可用于市场贸易的食品材料数量,从而将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以从事更多的贸易活动。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其对农业发展的拉动作用也会愈加明显,至于农民以何种形式来满足因“需求驱动”对增加供应的要求,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无论是用现代化的大农场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小农场,应让农民自己来选择。政府要做的是保证这种选择的公平和安全。